

经济发展中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D. 盖尔·约翰逊 著
林毅夫 赵耀辉 编译



商 务 印 书 馆

经济发展中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D. 盖尔·约翰逊 著
林毅夫 赵耀辉 编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美)约翰逊著;林毅夫等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ISBN 7-100-04252-6

I. 经… II. ①约…②林… III. ①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文集②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文集③发展中国家-农民-问题-文集 IV. ①F312.1-53②D42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718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D. 盖尔·约翰逊 著
林毅夫 赵耀辉 编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252-6/F·517

2004年9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½ 插页 1

定价: 45.00 元

中译本序言(一)

本书是从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国际著名经济学家 D. 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教授过去发表过的英文论文中挑选出的 23 篇文章翻译而成。这 23 篇论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经济学,特别是对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的探讨;二是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分析;三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问题的研究。

约翰逊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美国文学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曾经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和美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等行政和学术职务。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国际学术界顶尖的经济学家,他长期以来十分关心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对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做了许多开创性研究,这在国际经济学界是少有的。因此,译介这样一位有崇高学术地位的恩师、同时又对中国充满友好感情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

一、约翰逊教授生平和学术观点介绍

约翰逊教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艾奥瓦州(Iowa)云顿镇(Vinton)附近的一个小农场,自幼聪颖善辩。读高中时为参加一场全州的农业政策辩论,因所在云顿小镇的图书馆资料缺乏而写信求助于当时担任艾奥瓦州立学院(后改名为艾奥瓦州立大学)社会和经济系系主任的西奥多·W. 舒尔茨教授。舒尔茨教授寄给了他两本书,并出席了他的辩论会,从此开始了他们两人长达 60 年的师生、同事、事业伙伴的情谊,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约翰逊教授 1938 年在艾奥瓦州立学院获得本科学位,1945 年获得博

士学位,1941年起受聘为艾奥瓦州立学院的助理教授。后来舒尔茨教授为了一件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离开艾奥瓦州立学院转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他随后也转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1946年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约翰逊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业政策、农产品的国内和国际贸易、人口和经济发展理论等。他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在已经为农经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观点,例如:提高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甚微;增加农业补贴的结果是提高地租,增加农业产量,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其实很有限;要素市场的调整是使农民收入随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1947年他出版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是期货理论的奠基之作。1950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分成地租和资源配置”,提出存在土地市场并且地主可以自由选择佃农时,“分成地租”是一种和固定地租或雇佣劳动同等有效的制度安排。他的研究比张五常教授在1968年用科斯定理来解释这一现象早了18年。他也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苏联和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权威。总共出版和编辑了22本专著和论文集,并发表了300多篇学术论文。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而被选为美国科学和文学学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二、我和约翰逊教授

我和约翰逊教授的师生之情始于1980年的一次巧遇。那年秋天,他陪同1979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前来中国访问,当时我正在北大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有幸在他们短暂的北大之行中认识了他和舒尔茨教授,并在他们的热心安排之下于1982年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舒尔茨教授指导的最后一位弟子和约翰逊教授指导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从1982年到芝加哥大学读书以来,约翰逊教授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从他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为学之道,还有他执著事业、关心学生的品格。

约翰逊教授和舒尔茨教授一样治学强调经验事实,并以解决现实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理论。芝加哥大学发的讣闻中引用他的长期同事、诺贝尔奖获得者贾里·贝克尔的话说:“他研究的是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政策问题,他的研究结合了对数据的关注和细致的经

济理论分析来获得对真实世界问题的重要洞见。”从1980年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以来,他一直以这种治学方式来研究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2002年他写了5篇论文,对怎样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应对WTO的挑战,提出了建言。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也在他的鼓励下,选择了现实的中国农村改革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而且,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以经验实证来研究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尝试。回国工作以来,我在农村发展、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发展战略等问题上,一直没有忘记“理论研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理论研究以现实经验为出发点”作为选题和研究的导向。

约翰逊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科研行政者。他担任了10年的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1960-1970),两度担任系主任(1971-1975,1980-1984),副校长(1975),教务长(1976-1980),经济系本科生主任(1985-2002),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3-1998)。他把这些为人做嫁衣裳的事作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任劳任怨。芝加哥大学是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著名教授云集,尤其是经济系,教授人数虽然不多,但各有个性,在他担任经济系主任期间,居中协调,聘请、留住了多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后来回忆,就是因为被约翰逊教授月下追韩信的真情感动而没有离开芝大到耶鲁大学去。1985年开始,直到他于2003年4月13日去世,约翰逊教授一直担任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杂志《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的主编。他患的肌肉萎缩症从2002年开始恶化,2003年4月6日他过世前一星期我去美国探望。当时他说话和行动已经非常困难,但他还在处理这本杂志的来稿,看到他虚弱地坐在计算机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键,发信邀请专家审稿、给作者写编辑意见的一举一动,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遗产。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约翰逊教授对学生的关怀。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除了我之外,赵耀辉、宋国青老师也都是他的学生,在国内和国外也还有许多中国同学得到他的帮助而完成在芝大的学业。他对学生可用中国人所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来描述,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强调学生的责任,而他

强调为师的责任。我在芝大读书时,他是系主任,工作非常繁忙,可是从来不计较自己的时间,有问题向他请教时,总是耐心的帮助,毕业以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帮助我和其他学生,给我们创造表现的机会。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D. 盖尔·约翰逊年度演讲系列,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前去作报告,在他的建议下,我荣幸地做了这个讲座的第一讲,使我有机会将自己这几年的研究心得面对面地和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直接交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自己现在也由学生变为老师了,他对学生的这种关心、支持永远是我效法的榜样。

三、结语

这本论文集得以出版,赵耀辉教授作了最多的贡献,从最早的构思、文章的挑选、翻译的把关以及和出版社的联系等等,都是由她一手负责。没有她的恒心和毅力,这本论文集将不可能面世。参加翻译的有郭建宏、李利明、李志赟、刘培林、夏业良、熊鹏、袁嘉和章奇。参加校对的有葛玉好、何英华、胡书东和王格玮。商务印书馆的刘学军博士在本书的计划和编辑过程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本书就不可能摆在读者面前。

这本书的整理、翻译开始于约翰逊教授还在世时。他去世前的几年,每年都要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好几趟,我们在翻译、研究或工作上有问题时可以及时地向他当面求教。不幸的是约翰逊教授已经于2003年4月13日撒手人寰,永远离我们而去,未能让他在临终前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约翰逊教授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关心鼓励我们的好老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失去了一位关心爱护的长者,中国农经学界失去了一位热心支持的朋友。沉痛哀悼之余,约翰逊教授的风范长存我心,作为他的学生,他将永远激励着我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前进不断努力!

林毅夫

2004年8月3日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译本序言(二)

有人对我过去若干年撰写的文章感兴趣,并且愿意把它们翻译成中文结集出版,我感到很高兴。我在芝加哥大学已经工作了 50 多年,在这样一所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任教是我的荣幸,更让我感觉荣幸的是与世界上几位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共事,同样荣幸的是我的许多学生已经成为出色的经济学家,能够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一些影响,我对此感到十分自豪。我还感到荣幸的是,在过去的一些年当中,我有过许多能干的中国学生,他们中的两位是这本书的编者,而我主要负责这本书中文章的挑选工作。

本书收录的文章包括三类。大约有一半是关于中国发展中某一方面问题的,主要涉及农业、农村生活和人口增长。在我对中国产生兴趣之前,我花了许多年去尝试理解苏联和中欧的发展。1955 年我曾作为一个农业代表团的成员首次访问苏联,我们到了苏联农村的许多地方,参观访问了 30 多个集体和国营农场。本书有三篇文章是关于苏联、中欧农业的,包括一篇论述苏联解体以来艰难的转轨问题。中国农业改革的成功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绝大多数国家改革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书的第三组文章讨论的是更为一般的问题,主要讨论的是政府在农业和农村生活中应该起什么作用,以及在发达国家过去两个世纪中、在发展中国家过去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农业对实现人类福利的巨大改进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试图论证,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知识创新使我们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世界食物供应状况,并且取得了工业产品和服务供应的巨大增长和进步,这些使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过去两个多世纪,特别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知识的巨大增长,是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由于人口增长,我们才有了更多有能力创造知识的人;由于收入增长,才能有更多的人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知识创新活动。

在讨论一般问题的文章中,我特别强调政府的政策对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重要性。政策不仅重要,而且十分重要。如果政策是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工作、储蓄、投资和有效利用他们的资源来改善自身条件的,那么社会就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农村改革通过政策的改变,给予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使人们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们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改革使农业生产得到空前的提高,使乡镇企业得到蓬勃的发展,由此带来的中国农村的变化速度,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如邓小平所言,连改革的推动者们当初也没有预料到会变化得那么快。我在“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一文中引用了邓对此变化速度表示惊叹的一段原话。

出于对苏联农业的组织及其绩效的研究,我曾经尝试理解中国的发展。但是,我对中国产生兴趣,主要得归功于我的女儿凯伊·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了中国农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以《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在大多数社会,包括我自己所在的社会,在女儿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时,人们往往指责父亲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女儿,但是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女儿感兴趣的东西。

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T. W. 舒尔茨教授和我应谢希德博士的邀请到复旦大学讲学。谢希德博士当时是复旦大学负责学术的副校长,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最近担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在此之前,我作为芝加哥大学负责学术工作的副校长,在她访问芝加哥大学时接待过她。我和舒尔茨教授一行是1980年12月到中国的,我们在复旦大学讲学两周,随后访问了河北省的武功村,最后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间我和舒尔茨教授在北京大学讲了一些课。当时为舒尔茨教授担任翻译的是一个叫林毅夫的学生,他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返回中国。他起初在政府机构任职,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并且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次旅途中,女儿凯伊和妻子海伦同行(海伦现已过世)。那是我到中国的第一次旅行,至今我已经到中国30多次了。我为自己有这么多次机

会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去了解中国而感到幸运,其中有无数次的访问(包括访问农村),有与来自中国与东亚的许多学生的交往,以及我在中国期间朋友和许多莫不相识的人对我的殷勤招待和帮助。自1980年以来,我还有幸在中国做了许多次演讲,并参加了许多次研讨会。

毫无疑问,一个可爱的女孩使我对中国更加感兴趣,她的全名叫唐丽·海伦·约翰逊(Tang Li Helen Johnson),1991年我的女儿收养了她。过去的日子里,看着她成长是一件令人十分愉快的事情。她原是一个弃婴,被拾到后送到武汉一家著名的福利院。来到这个福利院是她的福气,因为那时她还是婴儿,一而再地患了肺炎,而福利院为她提供了必要的救护。唐丽是她在孤儿院时的名字,她的养父母保留了这个名字。

在1980年开始研究中国是再幸运不过的事了。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因此我有幸相当直接地见证了高度成功的初期农村改革。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改革,都不能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相媲美。能够观察和研究这一剧烈变化并尝试理解其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是十分有意义的体验。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农村改革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在一些文章中我详细讨论了这些缺陷及其影响,以及怎样纠正这些缺陷。任何一个熟悉我的研究工作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批评的人。一些人说我特别喜欢批评,不仅仅对我自己国家的农业政策如此,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农业政策也都如此。我的一本书的标题《失序的世界农业》(*World Agriculture in Disarray*)就表明了我对各国农业政策造成的后果所持有的态度。混乱的根源并不在农民,而在于他们的政府和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了改革前政策的某些方面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有负面影响。认识到这一点是中国改革的过人之处,与此同等了不起的是,认识到了要想把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农业政策需要做出多大的调整。虽然如此,但是找到合适的政策框架仍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并且需要不断检讨,对需要修正的地方及时加以调整。幸运的是,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认识得很深刻,很到位。然而,中国目前的政策仍然存在

大量需要调整之处。中国面临繁重的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调整任务。如果让农民分享到经济增长和快速的人均收入上升的好处,在未来的30年里农业劳动力的队伍就必须减少大约2/3。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应该只有10%从事农业生产。要使这一调整能够成功实现,农村和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就必须保持较高的年增长率。

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完成的变革,比已经完成的更为困难。过去的改革在提高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方面是非常成功的。然而,改革初期业已存在的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缩小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缩小。缩小该差距需要持续而稳定地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实现这一调整,同时维持农业产出的增长,使之大致等于需求的增长,就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尤其是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和替代劳动力的投资。如果中国农业想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并且想让农民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那么在未来30年内,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许多倍。我最后再强调一点。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试图说明一点:农民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资源(包括人力的、物质的和金融的),还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运作状况(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市场)。操纵产品价格是各国政府通行的做法,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很有限,而在长期则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高低只会影响投入到农业中的生产资源的数量,但是对那些资源的报酬并没有什么影响,只有土地除外。确保农民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善要素市场的运作。这点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每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劳动、土地和资本或信贷)在中国都依然受到很大的约束,存在很多缺陷。中国未来要素市场表现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绩效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D. 盖尔·约翰逊

2000年9月20日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目 录

中译本序言(一)	i
中译本序言(二)	v
中国的经济改革	1
中国是否存在粮食问题?	24
中国未来的食物供给:中国会让世界挨饿吗?	44
农业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增长吗?	55
中国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成效和问题	73
中国的粮食贸易:若干政策思考	90
中国农业调整:问题和前景	101
中国的农业与加入 WTO	118
中国能否通过在农村创造非农工作职位来转移大部分农业劳动力	131
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	150
制度和政策对农村人口增长的影响——以中国为例	169
论对人口与食物问题的重新讨论	200
未来 25 年需求增长将制约食物产量的增长	218
人口与经济发展	237
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	257
人口、食物与知识	269
苏联集体农业的理论和实践	291
东欧和苏联农业的历史经验	306

前苏联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转轨	327
经济增长与农业：两者如何相互促进	345
再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59
政府在农业和农村生活中有限而必不可少的作用	375
农业与国民财富	392

中国的经济改革*

一、引言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对工业改革则着墨不多。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与工业改革相比,农业改革更加彻底,而且效果也更加显著。当然,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还依旧是一个农业国,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最后一个原因是在城市和工业改革中,中国虽然进行了无数次试验,但所有这些试验取得的成果都无法和农业改革取得的成果相提并论。这并不是说在城市里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实际上,对普通市民而言,已经发生了不少重要的变化,不过,这些变化还仅仅表明在现有体制框架内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例如增加商店营业时间,向农户开放市场,使农户可以直接向城市居民销售农产品,从而使城市居民也能享受到由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好处。

在人类历史上,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同时发生剧烈变动的事例并不多见。即使发生了这样的变动,一般也多是武装冲突或革命的结果,例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1949年的中国革命,以及18世纪的法国革命。美国的革命尽管带来了重要的政治影响,但是对改变我们的经济制度几乎没有任何影响。然而,在中国农村发生的和平革命,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1952年在中国推行的土地改革制度和1957年建立的农村公社制度。

现状总是难以改变,只要看看我们自己周围的政策或制度,就会对此深

* 原文题为“Economic Refor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载于《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88年4月,增补版,第225-246页。

信不疑。从美国看，我们在错误的能源政策上冥顽不化了多长时间。因此，可以说，中国农村和平地实现了经济与政治制度的过渡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成就，在现代历史上只有少数事件，如果有的话，才能与之相媲美。中国的农村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改革的进程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自1949年共产党革命结束以来，几乎年年都有不寻常的事件发生。1949年到1952年是恢复期，这段时期取得的成绩很大。内战后期的高通货膨胀率——它是造成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因素之一——成功地得到了控制，农村完成了土地改革。1949年前，约1/3的农村人口在解放区内，即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控制区外进行了土地改革，余下的2/3的农村人口在1949年之后不久也进行了土地改革。^①结果，到50年代初，绝大多数中国农村家庭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尽管这一权利很快就在随后的农业改革中被剥夺。

由于年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大约为9%，所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7年）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在这段时期，农业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到土地改革结束时，有将近1亿个自主经营的个体农户。但是，正如大多数共产主义经济那样，家庭农场很快就受到了压力，被迫向社会化的耕作单位转变。最初的形式是互助组，在互助组中，畜力和机械可以互相借用；接着又成立了合作社，土地被并入合作社，实行集体耕作；到1957年，绝大多数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接着所有的合作社突然间就过渡到了农村公社。

就和平时代对人民的影响而言，“大跃进”（1958—1960年）算得上是最大的事件之一。个体农场和互助组于1958年被并入农村公社，同年也开始提倡土法炼钢，许多农村家庭用具被熔化掉，用来制造毫无用处的物品。中国经济学家许涤新是这样描述那段时期的：

^① 许涤新等：《中国经济增长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2年，第4页。

“然而,从1958年开始,片面强调高速度的‘左’的错误,没有被制止,开始向全国蔓延。周恩来的合理建议被否定。‘大跃进’运动发动起来,号召一年之内产量翻番。诸如号召大炼钢铁、亩产超过75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以及‘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等做法,都普遍得到了拥护。”

“在工业方面,中央决策者盲目指挥,给生产建设下达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且当这些指标下达到地方后,又被层层加码,以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在农业方面,高级农业合作社被轻率地合并为农村人民公社。这些公社的规模迅速扩张,许多公社甚至囊括了一个县的全部人口。人民公社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的管理体制。虽然实际的生产工作是由生产队完成的,但是从一开始,人民公社的分配与核算工作就与生产队脱离,由人民公社或生产大队承担。在严重的‘共产风’影响下,平均主义盛行,农村各单位人力和物质资源被随意调拨,而无视其隶属于哪个集体单位。所有这些都打击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

“这些错误的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农业产量不仅没有翻番,增长率实际上还下降了。从1958年末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的前期阶段,中央对‘左’的错误有所认识,并试图加以纠正。然而,在会议后期却发动了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所谓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再度在全国范围内盛行,工农业生产状况更加恶化。”^①

我在1983年遇见过一个从中国来的年轻人,他谈起了在农村公社成立后的几个月里所发生的情况。在一个较短暂的时期内,生产队的所有成员都在一起吃饭,公社食堂免费为他们提供食物。曾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年轻小伙子认为这种制度是一种好制度,因为可以和他的好朋友们共同进餐,而且食物质量较好,分量充足。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会儿,当他继续往下

^① 许涤新等:《中国经济增长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2年,第9-10页。

说时,他突然脱口说道:“后来我们就挨饿了。”他指的是影响了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大饥荒的来临。这次饥荒导致了大量人口死亡。^①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大饥荒的发生,不过,恶劣天气只起着有限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许多中国官员相信了这样的荒谬宣传——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1957年产量的两倍。1958年丰收后的那几个月里,人们吃掉了过多的粮食,结果在那年的头几个月里,粮食就基本消耗殆尽。在“大锅饭”的情况下,没有合理的市场信号显示粮食消耗过快,等到发现时已为时太晚。正如那个年轻人所说的,尽管1958年的粮食产量是很不错的,比1957年的情况还要好,但是在前几个月中吃了过多的粮食,而在另外几个月里却没有粮食吃,结果导致数千万人饿死。

国民经济从1961年开始恢复正常,“大跃进”时代提出的荒谬的产量指标被调低,建设项目被压缩,大多数压抑农户积极性的措施都进行了调整。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遭到了反对,生产队而不是公社或生产大队成为基本的生产和分配单位。公社成员重新开始从事家庭副业——几个世纪以来,大多数中国农民都从许多家庭副业中赚取收入,并利用这些收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农村市场也获准重新开放。

这些措施以及其他措施实施的结果就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了活力——从1963年到1965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4.5%,农业产量年均增长11%。

但是,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许涤新写道:“正当国民经济开始恢复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又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由于林彪和‘四人帮’占据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位置,……他们通过所谓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一浩劫持续了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时期。”^②在指出1967

^① 饥荒导致的死亡人数缺乏准确的统计。据估计,大饥荒导致了3000万人的死亡(见参考文献:B. Ashton, K. Hill, A. Piazza and R. Zeitz, “Famine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 No. 4 (December 1984): 619)。

^② 许涤新等:《中国经济增长研究:1949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2年,第11-12页。